

資本主義精神及其批判 的變化

● 布爾當斯基
(Luc Boltanski)

最近三十年資本主義的變化表現在三個方面：資本主義本身、資本主義精神和對資本主義的批判。

一 模式變化的三個主因

(一) 資本主義具有如下特徵：1、着重以和平方式進行無節限的資本積累。資本脫離物質的財富形式，並只能通過不斷循環和再投資來增長。脫離物質形式給資本帶來一種抽象的特點，並由此造成連續的積累。2、資本主義單位經常受競爭對手威脅，這為資本家帶來擔憂，並使他們懷有一種旨在通過不斷積累以自我保存的動機。3、職工不具有或很少具有資本，他們的報酬來自出賣勞力而不是勞動成果。這些人不具有生產工具，因此受制於僱傭其進行勞動的人。

(二) 資本主義精神：從許多方面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是一荒誕的制度。在這種制度中，職工失去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而且無法在依附性的工作外進行一種活躍的生活；就資本家來講，他們被綁在一無窮無盡、貪得無厭的過程中。對這兩種相互衝突的人們來講，嵌固於資本主義的過程尤其缺乏合理性證明。資本主義的積累要求動員眾多的人，可人們獲利的機會卻是稀少脆弱的。但是，至少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熱衷於這種實踐，在更壞的情況下甚至敵視這種實踐。在要求一種高度參與性的現代經濟中，這問題對管理人員來說尤其棘手。我們能指望的參與質量不僅取決於物質刺激，也取決於資本主義能否增進集體利益。我們將為參與資本主義，並使這種參與成為欲求目的進行辯護的意識形態稱為資本主義精神。

資本主義制度的荒誕表現在：職工失去勞動成果的所有權；資本家被綁在一無窮無盡、貪得無厭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積累要求動員眾多的人，可人們獲利的機會卻是稀少脆弱的；但是，至少相當一部分人並不熱衷於甚至敵視這種實踐。我們將為參與資本主義、並使這種參與成為欲求目的進行辯護的意識形態稱為資本主義精神。

(三) 資本主義的批判：批判資本主義的歷史與資本主義一樣悠久。資本主義恰恰是因成為批判的目標而獲得其合理性證明。如果缺少批判，這種合理性證明便是無意義的。然而資本主義不能自己去尋找這些合理性證明，因積累的要求，它很大程度上是自主於道德和政治的證明之外的。因此資本主義將通過構造那些一般性的規範系統來進行其合理性證明。我們可以從自十九世紀以來出現的資本主義批判中區分兩種類型。第一種是社會批判，它的批判重點集中在：資本主義造就一個不平等、貧困、剝削和自私自利、不斷刺激個人主義的世界，這種批判主要見於工人運動；第二種批判可以稱為藝術批判，它先是從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裏發展起來，其批判重點在於資本主義的另外一些特點，如批判資本主義世界的壓迫(市場的統馭、工廠的紀律約束)、大眾社會的整齊劃一和將所有事物商品化，這種批判頌揚解放的理想和個體的自由、獨特性、真誠性。

二 資本主義精神的組成要素

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一個相對來講穩定的、主要由經濟理論的論據組成的基礎。這些論據包括下列三個基本形式，它們重點強調：1、技術進步和經濟進步不可分割；2、競爭帶動生產的效率和效能；3、資本主義是有助於個體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的制度。

(一) 穩定的基礎。資本主義精神具有一個相對來講穩定的、主要由經濟理論的論據組成的基礎。這些論據包括下列三個基本形式，它們重點強調：1、技術進步和經濟進步不可分割；2、競爭帶動生產的效率和效能；3、資本主義是有助於個體自由特別是政治自由的制度。

(二) 歷史的變化調試。對普通人來講，為使他們能參與到具體的資本主義的工作和生活情境中，並抵制那些對資本主義的批評，那些由經濟科學所提供的資本主義的一般性證明就顯得太抽象、太一般化和太僵硬了。那些為資本主義精神提供營養的合理性證明應更具體的特徵，以便影響其陳述對象並為他們提供可以把握、理解的行動範式。今天，管理的話語就構成了讓資本主義精神寓於其中並被廣泛認同的典型形式。這是我們在本文中選擇以管理文獻分析資本主義精神變化的原因。

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具體表述中，有三個重要方面。(1) 第一方面的要點指示着為何資本主義參與是「刺激的」。也就是說，為甚麼資本主義是人充分發展的資源，以及它為甚麼能夠激發起人的熱情。這個「刺激」方面經常與資本主義提供的不同形式的「解放」理想相聯繫。(2) 第二方面的論點肯定那些參與資本主義的人，因他們這種參與活動為自己和他們的孩子所獲得的安全保證上的價值。(3) 最後，第三方面相當重要，尤其引起我們關注，就是引入正義原則論述資本主義如何以一種符合正義的方式為集體利益服務。如此構成的資本主義精神會因如下不同的情況而成為歷史變遷的原因：i、在一特定時期所採用的資本積累形式(生產的組成方式、利潤的市場資源、技術的可能性等等)。ii、迫使資本主義自身進行合理性證明、自我美化的資本主義批判的類型。

三 三種精神

從資本主義論述的演變中，我們可以歸納三種具連貫性的「精神」。

(1) 第一種精神與家庭資本主義相關，我們可以在松巴特 (Werner Sombart) 的描述中找到例子。資產階級企業家是主要代表。上述「刺激」的要素在這裏由企業精神所滋潤。保障的要素由對資產階級道德的尊崇所代表。最後，正義的設施體現在慈善事業和個體的幫助上。(2) 我們可以在二十世紀30到60年代找到描述第二種精神的範例 (如加爾布雷思 John K. Galbraith)，它集中體現在大型的整合性的企業上。主要代表人物是高級受薪主管。保障要素由職業生涯和私人資本主義配合於福利國家的發展所保證。而正義原則取績效主義的形式：依據各種經證明鑒定的文憑，這種精神是一種工業生產的邏輯與公民精神的妥協中和。(3) 第三種資本主義精神出現於80年代，這種新的形式在「方案體系」(la cité par projet) (其特點我們下面將談到) 中找到支持和表現。

必須明確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精神在資本主義進程中扮演中心的角色，它服務於這過程並約束限制它，而遠不是只佔據一個「精神輔助」或「上層建築」的位子 (像那些馬克思主義思路所設想的那樣)。事實上，那些使其中各部分的動員成為可能的合理性證明阻礙了積累。比如，如果我們將那些發達的合理性證明視為嚴肅的，所有的利潤就並不都是合理的，所有致富的過程也就並不都是正義的，那麼，所有的積累甚至那些重要和快速的積累也就並不總是合法的。行動者的有關某些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化給積累過程增加了並不只是純粹的、形式的約束壓力。資本主義精神在行動者心中的內化，給積累過程增加了不僅僅是純粹形式上的壓力。資本主義精神在提供有關資本主義合理化證明 (通過抵制那些激進的對資本主義的質疑) 的同時，也為那些揭露積累的具體現實與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規範概念間的差距，提供了批判資本主義的支點。

資本主義精神在提供有關資本主義合理化證明 (通過抵制那些激進的對資本主義的質疑) 的同時，也為那些揭露積累的具體現實與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規範概念間的差距，提供了批判資本主義的支點。

四 方案體系

為理解最近三十年來的資本主義精神的變化，我和夏貝樓 (Eve Chiapello) 在《新資本主義精神》(*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一書中通過分析兩個不同時期——60年代和90年代——150份各種有關管理的文獻 (其中許多譯自英文)，揭示韋伯 (Max Weber) 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在最近三十年來的許多重要變化。在我們看來，要把握這種變化就不能不考慮到一種新型的、合理性證明的系統——「方案體系」的出現。這個術語是對管理文獻中常見的「用方案進行組織」的仿用。它指出，即使是一個企業的結構也是由不同的人依不同的方案設想聯繫起來的。這種方案設想的本質是要有一個目標和一個結果，方案設想不斷地接續替代並按照提出者的需要和意願重組工作單位。用一種類比說法，我們可以稱一個社會是一個方案社會結構或用方案來進行一般性的社會組織。因而，



在《新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我(右)和夏貝樓(左)揭示韋伯所稱的「資本主義精神」在最近三十年來的許多重要變化。在我們看來，要把握這種變化就不能不考慮到一種新型的、合理性證明的系統——「方案體系」的出現。

「方案體系」表現為一種加之於一網絡式世界之上的約束系統，它鼓勵人們只在最大遵從被方案本身合理化了行動的前提下去結織關係和擴展他們的分支。

這體系具有下列特點：(1) 在這樣的體系中，活動是測定人們成就或事物重要性的標尺。但這活動與工業體制中把活動等同於工作的狀況不同，在工業體系中，標準的就業者就是擁有穩定工薪和生產工作的人，「方案體系」中的活動超越了那種將工作與非工作、穩定與不穩定、受薪與非受薪、獲利與義務，以及以生產性或非生產性等對立範疇來定義的活動。最重要的是展開活動，也就是說，總是要有設想和方案，有甚麼東西要實現、要準備，與其他具有意願成就些事情的人結合。方案設想的接續、替代，擴增了各種聯繫，由此使得網絡擴展。(2) 人們在這樣一種關聯的世界中，具有一首要的、自然的關注，就是渴望與他人結識、保持關係以便不被孤立。為達到這一點，他們必須贏得別人的信任，懂得與人溝通，並且有能力適應各種對他們有不同要求的情形，而不被內

向、僵硬或懷疑等特性所阻礙。(3) 在「方案體系」中的重要人物、能人，是那些能夠調適和變化的人。他能夠從一種情景轉換到另一種極其不同的情景，並能馬上適應。他有活力、自主並贏得他人信任，還能夠用他的觀念激發他人的熱情。(4) 這樣一個體系中的表表者，是那些在網絡的活絡和擴展中扮演活躍角色並像媒介者一樣行事的人。這就是那些計劃負責人，那些我們現在在法國稱之為「經理」，以區別於那聲譽不再、貶值了的號稱「幹部」的人。他們是創新者，其典型是學者和藝術家。相對那些舊的、從事計算和計劃的幹部，他們具有直覺、鑒賞力(flair)等最重要的素質。(5) 在這樣一個以建構關聯為其主要行動的世界中，存在着大量新型的、用於溝通的信息技術。一些設置，比如職業彈性化、加工、外包、獨立工作單位、免費等等，常被視為企業後現代、後福特、網絡化等特性的標誌。(6) 不適應此體系的是那不知參與的人，要麼因他無法獲取他人的信任或不懂得溝通，要麼因他的自我封閉，有過時的想法或專斷、不寬容的傾向。這樣的人被排斥在網狀的世界之外，面臨社會性死亡。(7) 能人和不適應者之間存在相當距離，後者通過對能人輸送忠誠和信任而參與到計劃方案中，能人則通過提高那些不適應者的能力而提高他們的可僱傭性。(8) 這樣的體系所要求的能人是要犧牲所有可能妨礙其自我自由處置的人。這些人放棄握有一終身不變的計劃(職業、婚姻和聖職等)。他是流動的，不會永遠遵從一套固定的價值觀(對所有價值寬容這價值本身除外)。(9) 檢驗的模式是從一種方案到另一種方案。(10) 其自然的形式是網絡。它甚至在行動者不知曉的情況下作用於所有存在的事物，包括人類和非人類。

上述提及的特點主要針對企業世界，但近來的研究證明這些特點同樣適用於其他領域。為了把握最近三十年來的規範的變化，我們引進檢驗 (épreuve) 的兩種形式的概念：力量檢驗和合法檢驗。後者是指那些合法的、制度的如工業生產能力，學生對家庭作業的遵守與否等檢驗。被接收參與其中的力量已被規範化、合理化。而對前者來講，所有力量都可參與其中而不需要特殊鑒定。所有能幫助成功的都是好的。與這兩種檢驗形式相對應的是兩種行動的制度：一是範疇化制度 (épreuve de catégorisation)，其中行動所面對的是公共空間中的評判檢驗。而這評判依據的是一些明示的，通常是法律化了的平衡原則。因而，這樣的制度將一些具有一般有效性的、外在性的、超越獨立於那締結時的具體情境的公約作為參照；另一種為換置檢驗制度 (épreuve de déplacement)，其中行動的方向和那些參與行動的力量，隨時隨情境和所遇到的障礙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所謂檢驗，就是一種力量的檢驗。換置檢驗省略掉了評判。與範疇化制度相反，換置檢驗不以公約作為參照，它既不需要外在性也不需要一般性。

五 從1960-70年代到1980-90年代批判變化的源頭

1965-75年標誌着批判資本主義的高潮，這高潮在1968年和稍後一些年份達到頂點。這些批判給資本主義帶來嚴重危機。因為這些批判並不只是口頭的和伴隨着些罷工和暴力，它還造成令工業產品質量降低的生產失序，並倍增了工資成本。這些批判將矛頭對準那些制度化的、奠定社會秩序合法性的檢驗。這些被批判的檢驗證明包括：(1) 工資和利潤關係相互依賴和增加值的共享。(2) 那些將權力和等級制關係(在工作中和包括在家庭中)的不對稱合法化的檢驗。(3) 那些奠定社會選擇的合理性的檢驗：就學、職業招聘、職業升遷等。這些批判揭示了前述的檢驗事實上違反了正義原則，也揭露了那隱藏依附在這些檢驗證明中的各種勢力和某些人所享有的優勢利益。這些高水準的批判警示了資本主義諸種制度的主事者，其中最重要的是老闆，他們十分擔心「權威危機」以及在企業中尤其明顯存在的那些年輕人「拒絕工作」的現象。

以1968年5月事件為中心的危機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社會批判和藝術批判各自扮演了旗鼓相當的角色。相較而言，在以往的社會危機中，藝術批判只出現在知識份子的小圈子裏。我們可以將這種變化歸結為60年代學生數量大增，以及同樣重要的幹部、工程師和技術員等文化資本持有者在生產過程中的重要性增加。在企業領域，藝術批判特別表現在職工參加工廠管理和強調個人自主以及創造性等方面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上(特別存在於CFDT工會中)。這些要求特別由技術員、工程師和幹部提出。相反，傳統的社會批判要求(增加工資、縮小不平等)由工會的大多數、接近共產黨的CGT承擔，其主要成員是熟練工人。

1968年5月抗議事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社會批判和藝術批判各自扮演了旗鼓相當的角色。在企業領域，藝術批判特別表現在職工參加工廠管理和強調個人自主以及創造性等方面的自我管理的要求上。相反，傳統的社會批判要求(增加工資、縮小不平等)由工會的大多數、接近共產黨的CGT承擔，其主要成員是熟練工人。

在法國，僱主組織不斷試圖在兩條不同的途徑上尋找走出危機的方法。第一條途徑，在1968-73年間左右，表現在極力拒絕那些與藝術批判相聯的要求，但卻傾聽與社會批判相聯的要求。如此一來，促使僱主組織尋找某種圍繞於自1950年以來達成的制度化的經實踐檢驗的與工會的和諧（在集體協議框架之內的協商談判，在國家控制下的全國性的談判協商等等）。對於被社會運動弄得迷失方向的工會來講，它們時常準備接收這種遊戲。這些談判協商帶來了一些結果，如低工資階層獲得加薪、工資不平等狀況減少、簽訂了幾個全國性的職工社會保障協定等。在那些取決於人事選擇和權威行使的情況中，批判具有使這些檢驗更合理、更符合績效主義理想並導致改變檢驗設置使其更難以訴諸各種不包含在正式的檢驗定義中的強力。批判因此具有增加我們稱之為檢驗的緊張（*tension*）的效果。這種檢驗緊張的增強，使那些直到現今因佔有不同資源、在不同的檢驗情形下具有優勢的特權行動者受到了損失。

自1975年左右起，僱主協會開始試驗第二種途徑的策略，就是放棄那些體現社會批判的制度性實踐措施，轉而傾聽那些新興的、與藝術批判相聯的要求。發展出許多我們稱之為「勞動條件的改善」的革新和試驗性措施。這些變化使得資本主義重新掌控勞動力並取得新的發展。

雖然有利於職工的措施付上相當高的經濟和象徵的代價，但卻沒有使危機停止。批判的聲音和生產的失序仍繼續高企。自1975年左右起，因第一次石油危機的衝擊使利潤大幅削減，僱主協會開始試驗第二種途徑的策略。簡略地說，就是放棄那些體現社會批判的制度性實踐措施，轉而傾聽那些新興的、與藝術批判相聯的要求。這種變化特別表現在勞動的組織上。相當多的重要企業因而發展出許多我們稱之為「勞動條件的改善」的革新和試驗性措施。這「勞動條件的改善」自1975年起逐漸成為僱主的術語。起先只是零星分散地進行，後來漸漸變為由僱主協會協調。這種協調工作或多或少受到勞動社會學家和那些出身於六八年運動的新型顧問的影響，逐漸發展出一種對危機的新解釋，如反抗傳統權威和不滿勞動的條件等。這些變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在對自主性要求的合理性的承認，以及將那些以往只適用於幹部的管理模式（自主性強的團隊、彈性工作時間、獎金、效率獎賞等）普遍推廣到所有員工。它們與在生產工具層面的變化相伴，一系列的轉型將大型的、嚴格整合的企業解體，代之以一系列以合同形式結合的小型網絡企業群體（轉手加工、代加工、將與企業主要功能不符的工作外放等等）。如果歸納來講的話，這第二種途徑放棄那些以往制度化的檢驗途徑（職業關係的系統）而有利於一系列的換置（*déplacement*）。這些換置導入了一些新的檢驗（如對工人溝通能力的要求成為一重要的選擇標準）。但這些新的檢驗的確認對那些服從它們的人來講卻是十分困難的，因為這些檢驗明顯沒有成為司法、規範化和程序化的工作對象。80年代的管理工作主要就在於協調這些變化並賦予其意義，尤其是用借自社會科學中的網絡語言來進行解釋。

六 批判的沉寂

第二條途徑在第一條途徑失敗的地方取得了些成功，這些變化使得資本主義重新掌控勞動力並取得新的發展。因這新的發展以兩種方式消解了批判的聲

音，從而獲取了自由發展空間。社會批判方面，作為其代表的工會因無法解釋這些變化而喪失行動能力。工會（它是與它的對手——那些大型的整合性企業——依同樣的結構建設起來的）的社會批判功能在這變化過程中喪失了以往使其能有效地影響僱主決策的能力。至於藝術批判，也因另一不同的原因喪失了其銳氣。大部分在六八年左右從事藝術批判的人，即使他們沒有被新的權力機構收編，也因後來在工作組織或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變化而感到滿足。資本主義在80年代的再發展與它轉換和廢置那在第二種資本主義精神範疇中適用的限制能力有關。在這個時期，檢驗的轉換和因困惑所導致的批判的沉寂，使得從以往種種必須遵從的限制約束中解脫出來的資本主義得到再發展。這種再發展的其中一個重要結果是，重新為工資／利潤的分享賦予一個對資本有利的意義。但這是社會不平等、生活不穩定、工薪階層的貧困化，以及工薪狀況的惡化為代價的。這在90年代引發了批判的回歸，尤其體現在1995年秋季的大罷工上。其批判的更新目前主要表現在社會批判的領域（藝術批判相當大程度上仍處在沉寂或老調重彈中），它引導着對制訂新的檢驗規範和確立某些新的、與第三種資本主義精神社會正義有關的新設置的思考。因此，現在法國相當大部分正被研究的新設置，都可視之為是想藉種種司法性的設置來確立「方案體系」。比如，在工作合同之外加諸的有關各種活動的合同，它將賦予職工在企業是否願意或是否具有能力保證的情況下接收培訓或為那些非盈利的組織工作的可能性。

從上述的例子，我們可以歸納變化模式的主要線條。(1) 將重點置於那些處於不確定和常常是衝突狀態中的人們的行動上，而不是將變化置於那些發揮命定作用的非個人化的力量上。(2) 這種模式集中在檢驗這概念上，並有兩種交替出現的檢驗制度。第一種是範疇化的檢驗制度，在其中檢驗得到承認，被制度化和規範化，可以對這些檢驗進行批判。第二種是換置制度，其表現在一系列的、制度化的檢驗的區別上，它們使得社會選擇和獲取利潤的途徑得以調整但略去高水平的思考和範疇化並且預支了批判。(3) 最後，這模式不是目的論式的，因它並不是以一種導向未來拯救的時間為基礎，如發展和進步，革命或歷史的終結。批判的工作將永遠不會結束，它需要不斷的更新再造。

張倫 譯

布爾當斯基 (Luc Boltanski) 1940年生，法國當代知名社會學家，中生代社會學代表人物之一，現任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EHESS) 教授。早年師從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共同撰寫有關藝術文學現象的著作。近二十年來從事管理階層的研究並進而對當代社會正義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發展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著作包括 *Les cadres. La formation d'un groupe social* (1982), *Justesse et justice dans le travail* (1989, 合著), *De la justification. Les économies de la grandeur* (1991, 合著),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1999, 合著) 等。其中尤以 *Le nouvel esprit du capitalisme* 一書最具影響。